

# 在埃塞的日子里

## ——一位援外医疗队长的手记

■ 张晓阳

### (三十三) 非洲缘



张晓阳出国前到医院看望母亲



张晓阳出国前，他的同事和亲戚朋友在为其送行。

也许是真的与非洲有缘。2003年，我——张晓阳被河南省卫生厅派遣到美国培训。回国后，时任河南省卫生厅国合处的处长赵书勤就开玩笑地对我说：“晓阳，你很适合当援非医疗队队长。”当时，我还是周口市中心医院的医务科长。每年我都要参加河南省召开的援外医疗工作会议。每年我们周口市中心医院都会派医生参加援非医疗队，所以对援外医疗工作或多或少有些了解。但由于当时工作很忙，我没能参加援外医疗工作。大家可能不知道，三甲医院的医务科是医院最忙的科室，曾有人开玩笑地说医务科科长的工作不是人干的。

谁知过了13年，这个任务真的要由我来承担了。2016年的4月20日，我和我们医院的于彦章院长准备到河南省卫计委汇报工作，出门时遇到了国合处处长王培仁。王处长说：“我正好找你们有事商量。”原来王处要告诉我们：“2016年的援外医疗任务由你们周口市中心医院承担。你们是队长单位，要尽快启动。”按照河南省卫计委的要求，必须由医院领导班子带队，班子成员就6个人，每个人都有实际困难——有的不是专业人员，有的专业不对口，有的是家里实在走不开。开会时我最后表态：“我去吧！”

实际上，我也很纠结。我母亲已87岁，并且处于植物生存状态，已躺在病床上6年；父亲已93岁高龄，经常走失。我走之后照顾二老的任务更多地压在了家人身上。

我父亲是老党员，妻子也是党员。当我提出要去执行援外医疗任务

时，他们都毅然决然地支持我。家国情怀，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当祖国需要我时，我就应该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为人民担当。

非洲是苦，但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越能磨练人的意志。经过在郑州为期3个月的培训，我了解了埃塞俄比亚的基本情况后，更加坚定了当好队长的信心。出发前一天的晚上8点，医院的同事、朋友、亲戚到我们家为我送行，但不知怎的，一年一次的胃痉挛突然发作，疼得我实在受不了。大家急忙把我送到我们医院急诊楼2楼的EICU。整个大厅站满了送行的人。大家一直陪着我到凌晨1点，疼痛减轻后我赶紧回家收拾东西，因为凌晨4点我们就要告别同事和亲属出发了。现在我离开祖国已经10个多月了，分别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同事和亲人们的恋恋不舍，领导们的殷切期望一直支撑着我。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

到非洲后，我和队员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去。在学习和借鉴了前几队和中国派往别的非洲国家的中国医疗队的管理经验后，我也在认真思考中国援埃塞俄比亚第十九批医疗队在今后的一年中工作该怎么创新。为了理清总体工作思路，我制订了“医疗队整体提高计划”，围绕这个思路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赢得了队员们的尊重，受到了埃塞人民的欢迎！我自认做到了不忘初心，不辱使命，无愧于祖国和人民！

(未完待续)

## 杨家全：于无声处写丹青

■ 张磊 王东

一本《杨家全书画集》的索引，让我认识了书画家杨家全。

我是在一个艺术馆里偶遇其书，翻看第一页，一幅黑山水吸引了我，这明显是师法黄宾虹，再往后看，幅幅有新意，张张有亮点，表现手法多样，可谓异彩纷呈。

杨家全出身农民，性格内向，不善言谈，更不会宣传、包装、炒作自己。他独守清贫，潜心于自己的书画创作，提高水平、追求高度是他一贯的治学理念。

他自己曾言，我不善讲话，我要努力让我的作品会说话，以作品征服人。

杨家全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喜欢写毛笔字，高中时代迷恋上书法，初学颜柳，先后又学董其昌、苏轼、黄庭坚、米芾、杨凝式、李北海、“二王”、张旭、怀素，近几年潜心临习孙过庭书谱，平时多以行楷、草书创作作品。其行楷飘逸清秀、古朴典雅，更多地吸收了董其昌和“二王”书风。草书方笔、圆笔并用，大小层差，浓淡干湿，轻重缓急，如诗如画，大气豪放，运笔灵活自如，章法自然天成，实为性情之书。

1998年，是杨家全艺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开始学画花鸟画。没有老师他就在书店购买一些学习资料，埋头研习，潜心研究，浸淫其中。为把梅

花画好，他租了2亩地养了3000株梅花，潜心观察梅花的形态和成长规律为实际创作服务。

2007年，杨家全考入中国书画院硕士研修生班，同时研修古代山水，先后师法董其昌、沈周、黄公望等古人名作，书画并进。因为他有书法的笔底，学画上手很快，仅《富春山居图》就临摹数十幅，已被艺术馆和个人收藏6幅。他能吃苦，惜时如金，敢于挑战，工笔写意无所不能，善于作巨幅长卷。他历时两年所做120米《梅花长卷》，至今无人出其右。

2012年，他的艺术生涯又翻开新的一页，迷恋于黄宾虹山水。他认为黄宾虹的山水画创造了中国山水画的一个巅峰，学就学最好的。画从书法中来，他有良好的书法基础，学“黄”很快。2014年，他又考入了中国国家画院范阳导师工作室，一心一意悉心作画，在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反复磨练，苦于思索，吸收高人的长处，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近阶段，他的画作吸收了一些董寿平山水画的技法，施以重彩，丰富了自己作品的表现形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期待他在书画艺术的道路上创作出更好、更新、更有个性的艺术作品来。

## 《脸的历史》： “脸”究竟有多重要

“世上最值得玩味的表面仍是人的脸”。人并不总是能成为自己脸的主宰者。进入公共空间，脸就需要遵循通行的社会习俗，而这造就了所谓的社会面具。

脸是社会面具的媒介，文化的载体之一。正因为此，远古时期的全球各地，彼此并无交往联系的原始部落，都形成了制作面具的传统。哲学家发现，面具具有展现与隐藏的辩证关系，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及其他古文明时期。到了近代，面具与脸被等量齐观，形成了埃米尔·涂尔干所说的“双重人”。

到了影像媒体时代，脸也成为了重要的商品符号。电视、电影、社交媒体上，开始塑造不同的脸，从电影电视时代制造的真脸基础上经化妆而成的“合成脸”，再到数字时代的“虚拟脸”。这些脸的图像取自真人面目，却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真人的形态。

脸是媒体工业、文化工业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20世纪发行量最为惊人的《生活》杂志，创刊后就推出了“脸”的专栏，力图向读者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图片会取代信息文本成为杂志的主导内容。《生活》杂志出版人亨利·卢斯的另一份杂志《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也成为了每期报道最为主要的

文化符号，最终成为了20世纪文化的典型印记。

欧洲著名艺术史专家汉斯·贝尔廷曾执教于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汉堡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2000年与多位来自于艺术史、哲学、神经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创立了跨学科的人类学和图像研究项目“图像媒体机构”。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这本《脸的历史》，深入探讨了远古时期至当代社会，脸在社会文化中的意义建构、进化、扩充与嬗变。

汉斯·贝尔廷说，肖像也是脸的替身，将面目表情从身体中剥离出来。从肖像画到摄影，人的面部影像始终没有脱离面具的本质。正是因为如此，启蒙运动中的人文主义者，希望借助文学作品而非绘画、雕塑来真正展现人的精神。

视频是游动的影像组合，预示着脱离面具的可能性，虽然在很长时期内，电影电视都仍然依照塑造面具的模式来创作作品。而到了网络时代，数字技术可以根据许许多多张人脸的特征，生成高度逼真的“虚拟脸”——这种象征不再关乎身体，“而是在一个可发展为数字乌托邦的虚拟空间内循环往复”。

(新浪)